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第二辑

侨乡·宗族· 围龙屋

——梅州南口侨乡村的
田野考察



周大鸣 段 颖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第二辑

侨乡·宗族·围龙屋

——梅州南口侨乡村的田野考察

qiaoxiang zongzu weilongwu

meizhou nankou qiaoxiangcun de tianye kaocha

周大鸣 段 颖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广东梅州南口侨乡村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成果。本书从侨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侨民经历、宗族历史、村落建筑等方面对侨乡村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田野调查,勾勒出侨乡村独特的人文景观。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客家社区、侨乡、宗族、围龙屋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段红梅 夏 青

责任校对:韩秀天

封面设计:智兴设计室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侨乡·宗族·围龙屋/周大鸣,段颖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30-1323-9

I. ① 侨… II. ① 周… ② 段… III. ① 侨乡—乡村—
社会调查—梅州市 IV. ①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4495 号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第二辑

侨乡·宗族·围龙屋——梅州南口侨乡村的田野考察

周大鸣 段 颖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邮 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 bjb@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025

责编邮箱: xiaqing@cnipr.com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 334 千字

定 价: 54.00 元

ISBN 978-7-5130-1323-9/D · 1490 (4199)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侨乡村：政治与经济	(12)
第一节 侨乡政治	(12)
第二节 侨乡经济	(34)
第三章 侨乡村：社会与文化	(63)
第一节 婚姻家庭	(63)
第二节 民间信仰	(89)
第四章 侨乡之侨	(111)
第一节 侨之源——侨乡的历史	(111)
第二节 侨之“缘”——侨乡文化	(122)
第三节 侨之情	(154)
第五章 侨乡宗族	(165)
第一节 宗族与侨乡社会	(165)

第二节 宗族的结构与运作	(176)
第三节 宗族与侨乡社会变迁	(201)
第六章 侨乡围屋	(213)
第一节 围屋的空间文化	(213)
第二节 围屋的历史脉络	(228)
第三节 围屋的表述和建构	(243)
第七章 结语	(262)
中文参考文献	(268)
英文参考文献	(274)
后记	(276)

第一章 导 论

众所周知，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石，出色的人类学研究离不开成功的田野工作。尽管田野工作在数十年间经历了从马林诺斯基整体论到后现代写文化的发展历程，反思日渐深入，方法更显多元多样，但“being there”、“从当地人视野出发”、“以他者为镜，反观自我”等研究策略，依然时时被大多人类学者所强调，而无论其风格与立场如何。因此，对于学习人类学专业的同学而言，无论本科、硕士还是博士，田野调查仍然是人类学的成年礼，是进入人类学殿堂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难得之生命体验。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自复办以来，一直坚持以田野为核心的人类学教学与实践，每年暑假都会组织大学三年级的同学赴各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实习。实习结束后，人类学系还会组织田野报告会，由各组同学报告田野调查的心得体会，通过交流，深化对人类学知识与田野工作的认识，而大部分学生均会以该次实习为基础，辅之以跟踪调查与文献研究，撰写毕业论文，其中部分进入研究生学习的同学，还会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拓展研究。一个月的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进同退，加深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彼此的情谊，因此，田野实习，也成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本科学生生涯中的难忘回忆。

当然，作为一门课程，田野实习严格按照人类学学科训练逐步完成，在进入之前，我们会指导学生事先阅读人类学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以及与田野点相关之文献，并根据自身兴趣，初步拟订研究计划。同时，组织学系中具有丰富调查经验的老师进行调查培训与动员。进入田野之后，我们将一个月时间大致分为四段，第一周进行踏查，即遍访调查之社区或村落，掌握社区的大致情况，对其有一概貌性的了解；第二周则根据前一周的调查，结合同学自己的兴趣，开始分组，在调查的同时，撰写调查大纲，提出研究主题；第三周则根据老师的建议，完善调查提纲，继续进行专题调查；第四周则开始逐步整理前期调查资料，并进入查缺补漏的调查收尾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月的调查期间，带队老师始终坐阵田野点，每晚组织同学进行讨论，总结当天的调查，解答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还可以彼此交换当天的调查情况，分享调查信息，避免重复调查，充分体现出团队合作的效能。调查小组每日还要填写调查进度表，互为参照，相互鼓励。重视人类学的整体观，则是团队合作的另一重点，在一周的踏堪之后，同学们虽然各自选定研究主题，但以社区为单位的整体研究则贯穿调查始终，这样就能很好地协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每一部分的调查都不是孤立存在，而应置于整体社会文化背景中。

2010年7月至8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7级11名本科生及3名研究生在周大鸣教授、段颖博士的带领下赴广东省梅州市南口镇侨乡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得到了当地政府与侨乡村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时值盛夏，天气酷热，但同学们不畏艰苦，积极努力，清晨7点进入村落展开调查，中午稍事休息，避开每天最热的时间，下午又继续进行调查，晚上则回到住处，进行总结和讨论。田野开始，我们就和学生强调，这次来梅州，尽管时间有限，但实习的目标，是要大家经历一次“完整”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而非田野旅行（field trip）。

当然，对于从未进入田野的同学而言，如何从日常琐碎中总结、抽象出研究主题，并根据主题发展出一系列研究问题，成为进入田野后面临的难题。我们建议同学们从侨乡村所呈现的基本特征入手，可以从社区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层面发掘，找出能简洁明了体现该村特点的关键词，并通过这些关键词，逐步勾勒出侨乡村的社会文化图景，依循这样的思路，在经过多次走访、讨论后，本书的主题逐渐浮出水面，即客家社区、侨乡、宗族、围龙屋。

梅县南口镇侨乡村为梅州著名侨乡，位于麓湖山脚，三面环山，风景秀丽，苍翠郁郁，溪流潺潺。全村面积1.5平方公里，由寺前排、高田、塘肚三个自然村组成，现有650户，村民2735人^①。村中以潘姓为大姓，2000人左右，小姓还有温、黄等。新中国成立后，地区行政改革，三村合一，命名侨乡村，顾名思义，侨乡村因其华侨众多而得名。侨乡村称谓由来虽只有半个多世纪，但其自然建村历史可上溯四百余年。村中建于不同时代的风格独特、错落有致的围龙屋建筑群，即是明证。由于保存较为完好，侨乡村被誉为“客家世界第一古村落”。

侨乡村的围屋大致可分为三个建造时期，早期以明嘉靖年间的老祖屋为代

① 统计数据由南口镇政府提供。

表,如老祖屋、品一公祠等,是客家宗族聚居、祠宅合一的大型集合式住宅;过渡时期以清中叶的上新屋为代表,随着宗族后嗣的开枝散叶,一部分潘姓族人分家之后,搬出老祖屋,另择新地,建设围龙屋;后期以清末的南华庐、南华又庐等华侨屋为代表,由于人多田少,当时侨乡村许多人被迫下南洋谋生,事业有成之后,荣归故里,置地建房,侨乡人一般称为华侨屋。

侨乡村围屋建筑各具特色,现存围屋98座,包括寺前排村30座、高田村28座、塘肚村40座。围龙屋以中央堂屋为核心,横屋面向堂屋,在两侧呈对称分布,堂屋位于中轴线上。后面半圆部分由院落、化胎和围屋组成,围屋两头与横屋后端相接;门前为禾坪与水塘,禾坪平时可晒谷,岁时节气时则作为临时的娱乐设宴场所,半圆形水塘,平时可养鱼、洗涤、防火,因水能聚财,所以屋前池塘大多也具有风水意义。而华侨屋则部分继承了围龙屋的特色,同时也融入了不少南洋建筑风格,规模未必有围龙屋大,但大多显得富丽堂皇,其中又以具有“十厅九井”的南华又庐最为出名。

除了围龙屋、华侨屋外,毅成公家塾也是村中著名的古建筑之一,充分反映出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族群特征。家塾由潘立斋、潘祥初两先生于光绪二十八年(1920年)捐资建造,为现今南口镇安仁学校的前身。家塾按塾学形式设计,共有教室八间、住房两间。最初教学形式为私塾教育,由族老聘请秀才、举人为教师,招收潘氏子弟就读。民国以后改为全日制小学,也招收其他姓氏子弟。在华侨捐资建立的安仁学校成立后,毅成公家塾则成为安仁第一分校,解放后曾做过幼儿园、村委会,现修葺后作为侨乡旅游景点向外界开放。

缘何在粤东山区存有这样一个具有如此丰富人文景观的客家村落?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侨乡村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地方宗族的发展以及下南洋的经商传统息息相关。早期,客家从外地迁移至此,繁衍生息,为团结族内力量,齐心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客家移民逐渐形成聚族而居的特征,而祠宅合一居住形式,凸显了以“尊祖敬宗”为核心的宗族价值观与道德规训,并在居住空间中具体展现出来,换言之,宗族组织的内聚力促成了围龙屋的建造与拓展,而围龙屋构成的生活共同体则进一步强化了宗族在客家族群中的影响力。

此外,清末民国时期,侨乡村人多地少,这也迫使许多乡民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多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谋生。一旦发展顺利,他们就利用宗亲、乡亲等关系,将家乡亲友带到南洋,扩展生意,由此,形成了早期的跨国网络,人、物、资本就在这样的移民链中流动,并在来来往往之间建立了“南洋—侨乡”的双边社会。但是,在当时,侨民并不想在异国他乡扎根长住,仍

期望有朝一日能落叶归根，衣锦还乡。所以，经商有成的侨乡先民总会将所赚大部分钱财寄回家中，买房置地。这也是 20 世纪初期，侨乡村接连兴建许多华侨屋的基本动因。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疆界逐步确立，传统的移民流动受到国家建设、区域格局以及意识形态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减弱，跨国连接亦多受阻隔。随后，“土改”、国有化运动没收了宗族尝产，生产队、人民公社等对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又打破了侨乡社会固有的血缘关系，同时，在东南亚地区，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艰难，境遇堪忧。因此，原先依靠双边流动所建立起的富庶景象，在诸多变革中逐渐成了逝去的繁荣。

改革开放后，定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纷纷回到故乡省亲祭祖，这为重新恢复海外华人与故乡的跨国联系创造了契机。时过境迁，当年以宗亲、血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因老一辈华人的过世而逐渐变淡，侨乡与海外华人的关系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与再续。他们回乡祭祖，探望近亲，但在更多时候，他们将捐资和投资区分开来，而因循客家人崇文重教的传统，侨乡村的海外亲属大多将捐资集中于学校教育，包括重修安仁学校，新建安仁学校教学楼等。

另外，侨乡村特有的历史人文风景也引起了世人的注意，百年老屋、百年家塾、百年古树，使之成为具有典型客家特征的古村落，而南华又庐、德馨堂、承德堂等民居相继被评为省、县文物保护单位。福建土楼的申遗成功，又给了地方政府以及侨乡村民极大的启示，村民的观念也在经历着从“祖产”到“遗产”的转变，旅游开发、文化遗产等现代性产物逐渐成为村民日常议论的话题。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步投资，着力打造以侨乡村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并开始准备将围龙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切，再一次改变着侨乡村的发展愿景。

由上，我们大致勾勒出侨乡村的社区历程以及社会文化图景。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对于一个有四百年建村历史的社区而言，历史究竟如何书写，尤其是微观视野下的个人、家庭与社群之历史。客家之客，侨乡之侨，其文化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展现出来？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如宗族、围龙屋及跨国网络）又如何沉淀于村民的历史记忆中，对当下侨乡村民的生计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婚姻、家庭与亲属关系又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在不同时期，侨乡、宗族与围龙屋经历着怎样的变迁，三者之间的联系又是如何？面对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侨乡村又何去何从？此即需要我们重回社区研究的整体视野，结合历史发展之脉络，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入手，一探究竟。

在展开进一步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相关领域之研究做一概要回顾，并

由此建构本书之叙述结构与理解框架。根据调查主题,文献回顾将集中于历史文化视野下的客家研究;围龙屋与客家文化;海外华人、跨国网络与侨乡三部分。

历史文化视野下的客家研究

相较于广府、潮汕及其他地域性华人族群,客家族群有自身的独特性,其历史形成及身份认同的演变和确立是在迁徙过程中完成,客家族群在国内的不停流动及其向海外的迁移又形成了一个再迁徙和认同重构的过程。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后^①，“客家学”(Hakkaology)日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内容涉及客家族群的形成源流、宗族组织、民俗文化、方言艺术、客家生态、客家人物、客家方言、婚姻家庭等诸多方面,涉及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客家社区^②。其中,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对客家民俗、经济及宗族组织进行了详细分析^③,庄英章则致力于台湾地区客家族群家族与婚姻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客家文化的再生产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野^④。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客家学”与“华侨华人研究成果”的糅合,使“全球客家学”(Global Hakkaology)也应运而生,客家移民被置于跨国网络的研究之中。超越了客家发展史分期、源流考据等传统论题,不仅分析区域或地方范围内的客家群体,也注重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下客家社群的身份调适模式,颜清湟从早期客家人移民的聚落模式与经济追求、早期客家人的社会组织、战后客家社团的功能与变革和客籍企业家与海外华人的企业精神等方面来探讨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并由此指出东南亚的客家人虽人数较少,但在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领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容忽视^⑤。郑赤琰、萧新煌等^⑥学者则将客家族群置于特定区域,探讨该族群内部诸如文化、宗教、认

① 罗香林著:《客家源流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89年。

② Myron L. Cohen. 1976.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2009年度,包括《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地域族群与客家文化研究》、《罗香林研究》、《廖安祥研究》、《客家梅州》、《梅县方言古语词研究》等8本。

③ 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④ 庄英章:《家族与婚姻:台湾北部两个闽客村落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4年。

⑤ [澳]颜清湟(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历史上的客家人》,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⑥ 郑赤琰:《客家与东南亚》,香港:三联书店,2002年;萧新煌、张维安、范振干、林开忠、李美贤、张翰璧:《东南亚的客家会馆:历史与功能的探讨》,载《亚太研究论坛》,2005年,第185~219页。

同等重要因素，或者客家人与其他社群之间的关系。

在海外客家人认同领域的研究中，艾伦·奥克斯费德（Ellen Oxfeld）对印度东北部加尔各答客家族群作了深入的田野研究^①。她强调国家和民族政治、不同种族从事不同职业的分层制经济和东道国以“洁”与“不洁”之间的象征性对立为基础的宗教制度，这个因素对确立和维持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种族认同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由于职业、教育和政治环境迥然不同，客家人的认同轨道会截然不同。而对于侨乡村过番的客家人，他们集中在东南亚及日本地区，但其认同的建构与重塑过程有一些共性的轨迹和影响因素，藉此更深入客家人的归属意识和心理。

刘宏、张慧梅则对“客家人”与“潮州人”加以比较，进而探讨客家社群的原生性认同，突出客家族群在与祖籍地的联系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网络建构的特殊性——是基于本土地方社会联系基础上的地方—全国—全球—祖籍地之间的多重网络联系及超地域的方言认同。在资料应用上，两位学者认为要较客观地再现客家族群的演变，则需重视那些反映客家人自身观念和情感的内在视野的文献、实物和口述资料。无论是跨国网络的比较视野，抑或是主客位结合的解读方式，均对本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②。

围龙屋、宗族与客家文化

围屋是客家的特色建筑形式，关于客家的研究或多或少地会涉及围屋。因此，围屋已然成为客家研究的重要部分。这类研究往往是从居住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更广泛意义上的客家文化^③。具体而言，何国强和林跃文对粤东凤凰人的专题研究中专辟一章来介绍传统民居，进行了详尽的图文并茂的描述。这里的传统民居正是广义上的围屋^④。房学嘉从民居建构的角度看移民文化^⑤，宋德剑则着重探讨了围龙屋的开发和利用^⑥。

当然，在客家研究中，宗族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宗族

① Ellen Oxfeld “Still ‘Guest People’: The Reprod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Calcutta, India”, in Nicole Constable (ed.) *Guest People: Hakka Identity in China and Abroa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② 刘宏、张慧梅：《原生性认同、祖籍地联系与跨国网络的建构——“二战”后新马客家人与潮州人社群之比较研究》，载《台湾东南亚学刊》，4卷1期，2007年，第65~90页。

③ 参见陈世松主编：《“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④ 何国强、林跃文：《人类学家眼中的图景：粤东凤凰人》，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

⑤ 房学嘉：“从民居建构看移民文化：以粤东梅州围龙屋为重点分析”，载陈世松主编：《“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2~441页。

⑥ 宋德剑：“客家围龙屋开发利用策略的人类学研究”，载陈世松主编：《“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2~451页。

里程碑式的研究,为后世学者探讨宗族与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提供了基本的论述框架^①。在客家学中,劳格文讨论了宗族发展与客家社会经济的关系^②,谢剑、房学嘉则强调围屋的建造和使用带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在维系宗族传承上也具有“生存”和“精神”上的作用^③。何国强同样是从围屋和宗族的紧密关系上去研究客家族群的生计模式^④。可见,从围龙屋的宗族特征上去考察客家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切入点。

围屋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此类研究侧重于建筑学的视角。围屋在形制上的特殊性吸引了众多建筑学家、艺术工作者对其进行解剖和白描。比如,陈志华、李秋香等人对围屋的建筑结构和功能意义进行详细考察,绘制了大量高质量的图纸。当然,他们也没有忽视围屋的社会功能,对围屋所在村落的社会文化生活也进行了实地考察^⑤。此外,围屋在风水上的讲究体现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房学嘉探讨了围屋内外俗神信仰,并从神圣空间的角度探讨了围龙屋的文化积淀^⑥。这些研究都是从微观层面将围屋从客家研究的范畴中单独抽离出来(但并未脱离“客家”的语境)进行细致分析。

围屋也作为一个超越客家研究的载体。虽然围屋是客家的特色建筑,但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问题由围屋引申开来。如,周建新记述了粤东地区客家人作为宗祠、祖屋空间载体的围龙屋面临城市拆迁的境遇,以及客家人对此的反应、态度和行动^⑦。作者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路径和文化抗争中的相互建构的分析框架,重点阐述了钟村宗族针对祖祠拆迁而发起的保护围龙屋运动的原因、过程、特点及社会文化意义,深入分析客家宗族社会与现代变迁,文化保护与现代化等问题,探讨文化抗争背后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及策略手段,回应人类学关于传统文化研究与保护的时代主题。

总体而言,与围龙屋相关之研究构成了客家研究的一道风景线,虽侧重点不同,但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本书关于围龙屋的叙述与分析,所展现的,既包括围龙屋建造的文化逻辑,围龙屋与客家族群的关

①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 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③ 谢剑、房学嘉:《围不住的围龙屋:记一个客家宗族的复生》,广东:花城出版社,2002年。

④ 何国强:《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

⑤ 陈志华、李秋香:《梅县三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⑥ 房学嘉:“从围龙屋的神圣空间看其历史文化积淀——以粤东梅县丙村仁厚祠为重点分析”,载《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2006年2月。

⑦ 周建新:《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系,同时也涉及围龙屋的历史与现状。作为侨乡村的一大特色,与侨乡、宗族相互勾连,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观照。因之,本书对围屋的探讨,糅合了客家研究中的宗族和华侨等社会文化因素,既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围龙屋的空间文化,同时也将其看做一个超越客家研究的载体——物质文化遗产。

海外华人、跨国网络与侨乡

1912年以前,中国关于海外移民的资料,散见于正史外国列传、明清实录、档案等典籍,但只是内容上关涉,并非现代语境下的跨国网络研究。1895~1912年是对海外移民研究兴起时期。时代背景下的“华侨”话题与“殖民”现实紧密相扣,羲皇正胤所著的《南洋华侨史略》^①自称是华侨史的第一部著作。王庚武评述这部著作:“尽管充满着基本错误,但却为其后的三四十年的华侨历史著作奠定了模式。”^②

1912~1949年,中国学术界对海外移民开始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陈达在华侨与侨乡网络领域做了开创性的重要工作^③。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迄今仍被奉为侨乡研究的经典之作。陈达先生通过对闽粤十县进行社会学实地调查,将移民影响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元素,分别考察了闽粤侨乡衣食住行、家庭婚姻、社会觉悟、教育、卫生、娱乐、信仰等方面的情况,以此分析了侨乡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变迁与南洋华侨的内在关系。书中所展现的数据一直为后学所征引,对跨国视野下的侨乡研究有奠基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后积极的侨资政策,凸显了具有跨国地缘纽带的侨乡角色,海内外亲缘乡情的多层互动也更为活跃,为侨乡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有分量的侨乡研究学术著作相继面世^④。前者如周大鸣、柯群英等学者通过文化深描的闽粤侨乡个案,着重探讨海外移民对侨乡本身的社会文化变迁,涉及祭祖与文化资本、移民对侨乡方言的影响、移民中的性别关系、侨乡民俗等关注视角。

此外,侨乡与海外华人的文化关联与互动,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多武等(Leo Douw, Cen Huang, Michael Godley)编著的《“侨乡纽带”——对华南

① 羲皇正胤(易本羲笔名):《南洋华侨史略》,1910年发表于东京《民报》。

② [澳]王庚武:《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东南亚华侨》,载王庚武著,饶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庚武教授论文集》,第235~236页。

③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华南移民社会:向海外移民以及其对生活水平的影响及社会变化的研究》,纽约,1940年。

④ 周大鸣、柯群英主编:《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

“文化资本主义”的跨学科研究》，精辟地分析了传统的关系纽带如何被建构于侨乡与海外的商业网络中，并引起地方文化再造^①。陈志明等主编的《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集中探讨了宗族、宗教等民间组织在跨国互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沿着时间的脉络，揭示侨乡角色的转变。全书以文化、认同和社会变迁为线索，通过乡土宗族、宗教文化、侨资经济等构建一个多层面的侨乡网络^②。

跨国网络的形成，双边社会的互动，同时也影响到移民群体的认同。王赓武先生^③指出种族、国家、阶级和文化四种认同维度组成了东南亚华人认同的多元性，分别由体质规范、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文化规范所规定。因而个体呈现多种的变化形式，如阶级认同有着跨越人种界限的逻辑基础；由传统华人价值观派生出来的历史认同，逐渐包容于文化认同等。这对我们以多元与变动的视角理解侨乡网络中的认同和情感，大有裨益。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相关的论述相继问世。龙登高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资源促进侨乡经济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侨乡社会由消费型向生产型转变^④。李明欢则超越出纯粹的经济关注，转而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对福建“侨乡”进行研究，包括对新旧侨乡的调研以及特定历史时期华侨农场的设置，进而呈现出侨乡人民的生活世态，其中，对作为侨乡社会之本的跨国民间网络所发挥的“侨”牌效应之分析颇为独到^⑤。这些研究均有助于我们探讨侨乡人民如何理解华人移民身处“两个世界”的社会形态，又如何看待华人移民为改变其不利地位而作出的各种努力。此外，庄国土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展现了17~20世纪初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华侨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宏观的跨国关系梳理，从历史视角审视和把握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演变脉络^⑥。为我们面对梅州南口侨乡村现实，探索客家移民与祖籍国的亲缘、语言和表现在共同心理状态上的文化基础提供了一个极佳的

① Leo Douw, Cen Huang and Michael R. Godley. eds., 1999. *Qiaoxiang T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in associ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② 陈志明、丁毓玲、王连茂主编：《跨国网络与华南侨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6年。

③ 王赓武著，饶楠编：《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

④ 龙登高：“粤闽侨乡的经济变迁——来自海外社会资源的影响”，载于《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⑤ 李明欢主编：《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

⑥ 庄国土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参照系。

因此，本书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社区研究为基础，在对侨乡村这一客家村落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进行整体考察的同时，聚焦于侨乡、宗族与围龙屋及其三者之间的关联。首先，通过对侨乡村“侨”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文化特征分析，引出侨乡村与“侨”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侨汇经济、婚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探讨，其中，跨国网络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侨乡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客家族群的流动特征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其次，通过调查发现，宗族对于客家族群认同与凝聚力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渗透以及历次运动，宗族组织的运作受到冲击。改革开放之后，在海外华人以及旅游开发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宗族及其相关的民间活动获得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进一步促成了地方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最后，侨乡村被誉为“中国最典型的围屋古村落”，而围龙屋、华侨屋的兴衰，又和宗族、华侨息息相关，作为客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围龙屋在百年历史中同样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从宗族共同体，到“封建旧物”，到“围不住的围龙屋”，再到文化遗产，围龙屋文化的建构过程，也见证了侨乡村发展、变迁的曲折历程。如今，面对中国社会转型，侨乡村的变化也映射出地方世界中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并置交织的转变过程。

全书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导论”，叙述本书的由来以及问题之缘起，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本书的论述主题与叙述框架。第二、三章乃基于社区研究，从村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展开，力图构建一个理解侨乡村的整体文化图景。其中，第二章“侨乡村：政治与经济”探讨了侨乡村的历史发展，当下的权力关系与政治格局以及侨乡村的生计方式、生产生活、集市贸易及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关系。第三章“侨乡村：社会与文化”讨论了宗族与华侨文化对当地婚姻、家庭、亲属关系与居住形式的影响，现今侨乡村所面临的空巢问题，此外，该章还探讨了侨乡村的民间信仰与仪式空间，涉及围龙屋内外的祖先崇拜、伯公崇拜以及香花佛事，展现出地方社会中丰富的信仰世界。第四章“侨乡之侨”则从历史的维度展现出侨乡村这一客家社区的海内外迁移历史与跨国网络的建构，并通过与“侨”相关的信件、侨汇、家庭史、生命故事的分析，反映出侨乡之侨的历史积淀与文化内涵。第五章“侨乡宗族”集中论述了客家族群、侨乡社会与宗族组织的紧密关系，同时也反映出侨乡宗族在民族国家进程中的复杂境遇以及当下的发展状况。第六章“侨乡围屋”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讨围龙屋、华侨屋的历史由来，建筑空间以及其中蕴涵的文化逻辑，并进一步讨论在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这一背景下，不同能动者对于围龙屋的理解、认知与实践。第

七章“结语”则对全书作一总结，并再次强调，侨乡、宗族、围龙屋共同构成了侨乡村独特的文化景观，反映过去，映照现在，昭示将来。最后，需要指出，为保护被访者隐私和权益，对书中涉及的敏感事件及人名均进行了技术性处理。

第二章 侨乡村：政治与经济

第一节 侨乡政治

社会如何运作，秩序如何维系？人类学自古典进化论时期开始就对相关问题有所涉猎。但直至20世纪40年代，政治人类学作为人类学重要的分支学科才出现，其重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蒂斯。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的《非洲政治制度》开创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先河。在书中，作者讨论了国家形成之前的政治制度，对非洲的有国家社会和无国家社会这“两种政治制度”进行了分类，与此同时，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尔人》进一步说明了“无政府”社会的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人类学进一步走向成熟^①，对人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人类学是“舶来之物”。早期中国人类学家并未对政治人类学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但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林耀华的《金翼》、杨庆堃的《初期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社会和家庭》^②、威廉·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③里都有对乡土社会政治方面的重要论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人类学界对乡村政治的研究陷于停顿。但是—些海外学者通过对台湾、香港和海外华人社区的田野调查，或凭借仅有的文献资料来研究中国社会。如弗里德曼对中国乡村宗族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的宗族社会——福建与广东》，尽管作者不能亲自进行田野调查，但是他还是充分运用了当时村落田野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将传统的村落置于区域社会进行研究，用以批判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由

① 主要著作有埃德蒙·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格拉克曼的《非洲的习俗与冲突》、维克多·特纳的《一个非洲社会的分裂与延续》。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进化论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塞维斯，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群队→部落→酋邦→国家”的国家起源模式，影响深远。

② Yang C K,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③ [美]韩丁著，韩惊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